

新生代

XIN SHENG DAI
历史学者

XIN SHENG DAILI SHI XUE ZHE FANG TAN LU

访谈录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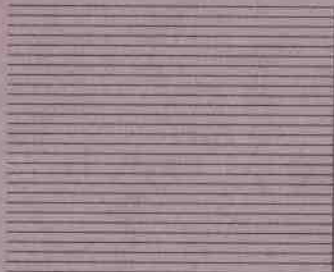
● 《历史教学》编辑部 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策 划：任世江

责任编辑：王公恣

装帧设计：刘莅舒



ISBN 7-80696-118-6



9 787806 961186 >

ISBN 7-80696-118-6

定价：18.80元

K825.81
26

新 生 代

XIN SHENG DAI

历史学者

XIN SHENG DAI LI SHI XUE ZHE FANG TAN LU

访谈录

第一辑

● 《历史教学》编辑部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生代历史学者访谈录/《历史教学》编辑部编.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5
ISBN 7-80696-118-6

I.我... II.历... III.史学家—访谈录—中国—
现代 IV.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4528 号

新生代历史学者访谈录

《历史教学》编辑部/编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天津金铁龙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256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80696-118-6

定 价:18.80 元

序

《历史教学》编辑部近几年来对一批中、青年历史学者进行了访问，现在把这些访问录汇为一编，即将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借此机会，我想谈几点感想。

第一，人才能否脱颖而出，与政策有很大的关系。1978年以后成长起来的这批中青年学者，受惠于高考制度的恢复。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①。这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今后写中国教育史，必须记上这一笔。1977、1978两年以及稍后考入大学的学生大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长则七八年，短则三五年，他们业务基础扎实，又聪明好学，高考制度一旦恢复，就考入大学，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努力，今天已有相当成就了。中青年学者还受惠于改革开放的国策。1978年以后，我国打破了闭关自守的状态，走向世界，大批青年被送往国外学习。《访谈录》里的许多位中青年学者都曾到国外学习或访问，有人还不止一次。了解世界学术的进展情况，开阔眼界，

当然大有好处。1949年以前,出国求学是很困难的;1949年到1978年,机会也不多,而且出国的范围主要限于苏联和东欧。我重提以上这些旧事,并非无的放矢,意图在于说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兴旺发达,个人才有前途;个人有了前途,反过来也应报效祖国。个别中青年把自己的成就完全归功于个人奋斗,这种看法是片面而不正确的。

第二,我希望中青年历史学者努力钻研,埋头苦干,抓紧时间,攀登历史科学的高峰。现在人们的寿命长了,活到七八十岁,不算稀奇,故而往往把四五十岁的人还戏称做“小青年”。其实,从历史上看,不少大学者在中年时代,甚至青年时代已经卓有成就了。王国维先生(1877—1927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利用甲骨文重建殷代信史的开山之作,也是他利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历史的典范之作,写成于1917年,当时王国维才41岁。陈垣先生(1880—1971年)的名篇《元也里可温教考》,写于1917年,时年37岁。享誉中外史学界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成书于1923年,陈时年未满43岁。陈寅恪先生(1890—1969年),关于隋唐史的两部影响深远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前者于1940年定稿,陈时年50岁;后者于1941年定稿,陈时年51岁。郭沫若先生(1892—1978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创之作,出版于1930年,郭当时才38岁。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的开一代史学研究新风气的《古史辨》第一册于1926年出版,顾时年33岁,是地地道道的青年。备受老一辈学者赏识的天才学者张荫麟先生(1905—1942年)^②,所

著《中国史纲》(第一册)要言不烦,内容深刻,文字优美,初版于1941年,张时年36岁,也是一位青年作者。对元史、中国近代史深有研究的邵循正先生(1909—1972年),所著《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他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的毕业论文,刊于1933年,邵那年24岁,按今天的标准来说,应算“青少年”中的“排尾”了,但《始末》一书至今为研究中法越南关系史者必读之作。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以上事例,就是恳切希望现在的中青年历史学者要珍惜大好时光,献身于历史科学,千万不要为一时名利所动,务必写出像前辈学者那样垂之久远的鸿篇巨制。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事在人为!事在人为!

第三,我希望中青年学者树立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良好学风。真正有成就的学者,从本质上讲,都是虚心学习的,不仅向前人学习,也向同辈学习。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在《文集》卷六《广师》中列举了许多位他佩服的当代学者,如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等等。陈寅恪先生推崇陈垣先生的史学成就,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一文中说:“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微以来,未之有也。”^④杨树达先生佩服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在赋诗谢陈寅恪为其著作写序中有句云:“朋交独畏陈夫子”,这确实是他的由衷之言^④。他也佩服王国维的学问,在1951年5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阅《观堂集林》。胜义纷披,令人惊绝。”^⑤人类至今,学科之多几乎无法计算。单以史学一科而论,就有全球史、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断代史,等等,任何一个人也只能懂得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一定要知道自己知识的

局限性,知道自己还有许许多多不懂的东西,必须向他人学习。也有少数大学者,十分骄傲,这是不可以为法的。

我对于写序,一向视为畏途,勉为其难。这次应《历史教学》编辑部之邀,很快就答应下来,主要是因为看到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其中有些同志是我很熟悉的),我国的史学事业后继有人,心中十分快慰,故不再考虑我是否合格了。以上几点感想,不过略陈拙见,聊供参考,非敢真以为序也。

齐世荣

2005年4月草就,时年79岁。

参考文献:

-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5页。
- ②陈寅恪在致傅斯年的信中称张荫麟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
- ③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页。
- ④⑤见《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第196页,第173页。

目 录

- 1/ 廿载不变的追求
——侯建新教授访谈录
- 19/ 探索历史的意义
——钱乘旦教授访谈录
- 31/ 文章得失寸心知
——李剑鸣教授访谈录
- 47/ 十年磨一剑
——马敏教授访谈录
- 65/ 追寻历史的足迹
——朱英教授访谈录
- 83/ 执著治学 上下求索
——吴景平教授访谈录
- 101/ “板凳十年冷”
——陈谦平教授访谈录
- 121/ 我和历史研究
——杨奎松教授访谈录

- 143/ 求新以务实为本
——李喜所教授访谈录
- 161/ 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
——杨念群教授访谈录
- 173/ 本色是书生
——著名民间学者沈志华教授访谈录
- 203/ “思想者是幸福的”
——萧功秦教授访谈录
- 237/ 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黄爱平教授访谈录
- 261/ 追求不断创新之路
——赵世瑜教授访谈录
- 279/ 新思想史研究、历史教科书编纂及其他
——葛兆光教授访谈录
- 297/ 勉为其难 尽力而为
——阎步克教授访谈录
- 313/ 专通结合 厚积薄发
——李治安教授访谈录
- 327/ 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我的课堂
——许纪霖教授访谈录
- 353/ 后记

廿载不变的追求

——侯建新教授访谈录



侯建新，男，1951年生于天津市，历史学博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杂志编委等。现任天津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院长、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

侯建新教授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项目（英国与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比较）、“八五”项目（冀中乡村经济与社会变迁）、“九五”项目（英国乡村生活史研究）、“十五”国家重点教材（英国经济—社会史）和原国家教委项目和天津市重点项目

等，还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牵头的多项国家重点课题。已出版的专著有：《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 11 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法律出版社、科学出版社，1999），《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与徐浩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001；台湾昭明出版社，2002），《经济—社会史：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另主编《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和《经济—社会史评论》（三联书店）。《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和《当代西方学流派》先后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研究生推荐教材。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例如：《西方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历史研究》1999—2），《西欧与中国社会转型比较初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4），《人文的和整体的历史：西方经济—社史会史初论》（《世界历史》2002—1），《主体权利与西欧中古社会演进》（《历史教学问题》2004—1），《近代冀中土地经营及地权转移趋势—兼与前工业英国地权转移趋势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4），《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生活与消费水平》（《世界历史》2001—2），《中英封建晚期乡村组织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00—3）等。作品多次获奖，如国家教委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征文一等奖，曾宪梓教学基金奖，并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自 1991 年，先后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莫斯科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从事研究或讲学，多次赴国外参加重要国际学术会议。

采访时间：2003年8月

采访地点：天津师范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赵文君

编者手记：侯建新，“文革”中“老三届”初中生，成长于计划体制之下，成熟于社会转型时期，所倾心研究的也正是社会转型问题。为什么英国率先进入工业社会？多数人研究都是从工业的起源入手，侯建新却从农民的变迁探索现代化的第一步。他从西欧中世纪的杂草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胚芽；从英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中找到了西方文明的胚胎；反观中国社会，他警悟到中国现代化的致命要害！其学说严谨而有说服力，令人耳目一新。他为了中国而研究西方，研究西方是为了现实中国。侯建新稳健而矜持，谈起自己二十年不变的追求——逐渐兴奋起来。

问：请谈谈，您是怎么喜欢上历史学的呢？

答：有偶然性，也有个人志趣。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过一个非常不幸的动荡岁月。“文革”前我在南开中学读书，1978年步入高校时，已是离开学校10年之后。进入历史系，很难说完全是兴趣的选择，不过，进入该学科后我从未后悔过，这大概与我的“问题情结”有关。每一代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倾注了更多的关心。“国家大事”对我们的人生影响太深刻了，或许还有其他原因。虽然在“文革”中已经不同程度地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但仍然难以磨灭对国家与社会前途的关心。新中国为什么发生长达10年的“浩劫”？有过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后来落后于西方？尤其晚近一二个世纪以来，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等日新月异，我们的民族却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这一类问题总是萦绕心头，挥之

不去。这些问题题目很大，找到答案确实很难。可越是力不从心，就越有诱惑力；越浏览中外历史，越令人迷惘，也就越使我着迷，甚至无法自拔。我以为，历史及历史学是回答这些问题最重要的学术资源，至今仍持这样的看法。

问：那么，您又为什么选择研究西欧历史，特别是英国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历史呢？

答：还是与最初的那个“问题情结”有关吧！问题在中国，可我不是从中国史，而是从西欧史入手的，那时我更急切地想知道西方是怎样发达起来的：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基础是什么？与中世纪、与农村农业的发展有无必然联系？英国及西欧如何从农奴制过渡到现代民主制度的？内在依据是什么？英国中世纪制度也有数百年历史，为什么能够率先确立起市场经济，进入近代社会，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我认为尚无令人满意的答案。上个世纪80年代初读研究生时，主攻方向就是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村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我写的第一本书《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专著。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先后主持了“七五”“八五”“九五”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还应邀参加了北京大学等牵头的3项国家重大课题，近年又主持了国家“十五”重点教材、教育部研究生推荐教材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项目，这些项目主要都是研究关于英国及西欧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这些研究使我较深入地理解了西方社会的来龙去脉。

问：可您同时还做了一些中国史研究、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您关于明清以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传统市场的分析，曾经引起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关注，那么，它们与英国及西欧史研究又是什么关系呢？

答：是的，80年代我就发表过《鸦片战争前农民个体力量考

察》一类的中国史论文,《现代化第一基石》一书以英国史为主,其中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涉及明清社会的历史。90年代,我发表了一系列中西历史比较的论文,近年出版的专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则是以中国史为主。1992年从英国归来后,我开始了这项中国史研究,并幸运地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课题资助和英国学术院的资助。我的中国史研究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始终与世界史研究密切相关的,实际上它们是一个题目。我研究世界史的初衷,是为求解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而考察中国历史时则始终有着西方历史的参照,而不是就中国论中国、以本土眼光看本土,这样,似可更好地理解历史的真谛。应当承认,就精力分布和已出版的成果而言,主要用于英国及西欧史,可我心中始终存在着中国问题的情结。1999年《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我,刊出的题目是《侯建新:最终是为了中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论研究英国史,还是研究中国史,中西历史转型这个主题始终未变。这个目标自我重返学校后,二十多年来矢志不渝,一直做了下来。

我以为,以问题为主线,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传统界限,将中国置于世界之中进行研究,同时以中国问题的视角研究英国及西欧史,双方都别有洞天,是一条可行的治学之路。当然,从中国问题出发,最后的专业不一定是中国史。虽然我对中国史有所投入,我的博士学位也是南开大学的中国史专业,无奈学力不逮,就我目前所从事的基本专业而言当划定在世界史即英国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不过,我以为,有中国史的问题与背景,研究西欧史也颇有助益,常常可以提出有价值,却被世界史学人、包括外国学者忽视的问题。

问:这大概是您的研究成果在国外引起关注的原因吧?您在西方高校包括剑桥大学一类著名学府有长期合作研究的经历,

能顺便谈谈对西方史学界的印象吗？

答：西方人的作品能够给我们许多启发，但也不要迷信。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由于文化的隔阂，常有隔靴搔痒之感，而研究他们本国的问题，同样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困惑。而且，他们的专业分工过细，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近年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等书被炒得沸沸扬扬，其实他们的作品就有上述缺陷，不少中外有识之士提出异议，我也有同感。西方史学界也有让人肃然起敬之处。其一是信息已经充分网络化。地处天涯海角的学者与身居大城市的学者可以做同样的题目，如果他们想说的话，因为他们享有同样的信息资源。信息与研究人员一样，达到了充分的交流，充分的社会化。其二是学术的严肃性。比如，学术批评，都是“真刀真枪”，在相互交锋和相互磨砺中交流思想，推进认识。追浪潮的现象并非没有，但难成气候；也不是没有垃圾作品，但难以成批量的生产。其三是原创性。这一点是最可贵的，既需要社会条件，也需要学者本人的条件，还有文化传统方面的影响等。现在谈这个问题的很多啦。

问：您在高校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已有二十余年，请谈谈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答：历史学教师和研究者必须有道德坚守，对历史必须心怀虔敬，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文革”结束已二十多年，但那个时代对史学的损害——我这里主要指对史学尊严的损害，不能说完全解决了。你知道，以往我国史学界受到“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研究模式的长期影响，为了达到论证某个观点或史观正确之目的，不惜剪裁历史，曲解史实，到后来也弄不清哪一种描述是事实真相了，历史学的尊严何在？浏览各类历史教科书和论著，现在也不难发现类似事例。所以，我赞成多年前提出的“修

正史学”，即对以往的中外历史认真梳理，反对将史学概念化、政治化、简单化，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这关乎向国民传达准确历史知识的问题，也是史德和史观的问题。

例如，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就是工业化，而工业化就是对农民的剥夺，便是一个明显的历史误区。其实，以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的历史为例，不是以农业的萎缩为代价，也不是靠“挤压”、甚至牺牲农民的利益，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吞噬掉之前，它是个体农民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普遍发展为基石的。此前不是农民的普遍贫困，而是农民的普遍富足、普遍积累和商品交换的充分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带动农村变革的群体——富裕农民阶层，进而发生了一场持续二百年的农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乡村面貌。要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

工业革命后，传统农民从英国历史上最后消失了。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不可忘记，这是英国真正的历史。它是农民的历史，也是现代化的历史。可惜，在以往我们的认识里，这一段历史多有盲点和误解。比如，关于英国圈地运动一类的原始积累，过多地强调了对农民的剥夺，而无视此前农民普遍的积累、普遍的发展，并由此奠定原始积累的基础；片面夸大暴力的作用，将原始积累的暴力现象本质化，以为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完全可以靠暴力确立，而无视原始积累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属性。实际上，英国的圈地者除领主和乡绅，也包括许多富裕起来并追求更大规模和更高效益的商业化农业的约曼农场主，不仅如此，甚至应该说农民佃户的圈地在先。随着土地公有权消失，个人使用土地的性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与传统庄园共同体敞田制迥异的个人土地所有制。村民们开始在自己土地的四周挖下壕沟，筑起树篱，此为最早的圈地。耕作者们几乎人人都在圈